



近十年修辞构式研究概观及再探讨

金志军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上海 200062)

摘 要:近十年修辞构式的研究主要在语法构式框架中展开, 修辞构式在本质上基本被认为是“语法构式”的补充, 或者说“修辞构式”和“语法构式”存在互补关系。主流研究着眼于修辞与语法可能的因果联结, 寻找构式框架中修辞的表现、修辞与语法的触碰点、修辞在构式框架中的心理认知特点以及构式框架中修辞与语法的错位等。本文认为“修辞”研究应该有其本体论基础, 对“修辞”的探究也应该从发现其概念本质的角度去切入和展开, 不应简单地将“修辞”归入“句法”或“语用”概念域里探讨。从狭义的语句修辞看, 不对称性如动词题元结构或数目的不对称、题元结构和句法结构的不对称、词汇义与世界知识的不对称、词性与句法功能的不对称等是“修辞”产生的源动力。要形成有效的“修辞”, 语句必须要在“修辞功能”的促动下, 使“未修辞体”和“修辞体”在“修辞界面”经过“修辞义”的“相似性”检验才能成功。“修辞构式”是上述“修辞”理论基础上的“修辞义”和“修辞形式”的结合体。“语法构式”是形成“修辞”的必要因素, “修辞构式”则是“修辞”形成后的形式意义有效联结的体现。推而广之, 从广义修辞上看, 不对称性和相似性之间的张力作用, 是包括语言修辞在内的所有修辞成功与否的根本因素。

关键词:修辞; 修辞构式; 语法构式; 相似性

中图分类号: H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8)02-0051-10

一、修辞构式与修辞本体研究的可及性

“修辞构式”这一概念来源于“构式 (construction)”, 而“构式”这个概念在语法学界则存在已久。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创立之初的标准理论 (Standard Theory) 时期, “构式”已经被提及^①。但是直到近 20 年后乔氏的原则与参数理论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时期^②, 句法构式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还是作为乔氏句法的原则理论所附带的现象出现。由于乔氏的句法理论对于作为语法外延的句法、语义、语音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做的是“界面”性研究, 并且他的理论不涉及语用,

收稿日期: 2017-09-20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条件下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修辞案例库建设研究”(16BZZ001) 阶段性成果, 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金志军, 男,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句法及修辞学研究。

① Chomsky, Noam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M]. The Hague: Janua Linguarum 4; Chomsky, Noam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MIT Press.

②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Dordrecht: Foris. Chomsky, Noam 1991, Some notes on economy of deriv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M], ed. Robert Fredin, 417-454.





这必然带来其理论对某些语言现象在解释上的困难。“构式”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并逐步被学界认识和肯定,从而得到了发展。

“构式”理论的产生有其本体论的基础,即在于确定有“语法”这一事物的存在。“语法构式”是建立在“语法”基础之上的。构式理论中的语法在结构上等同于乔姆斯基的“句法”。自乔姆斯基将句法学形式化地独立于其它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如语用学等)以后,针对句法内部外部关系的研究已相当成熟。乔氏的句法学在研究方法上抛弃了前期语言学研究的归纳分类法而采用了假设演绎的研究方法,竭力揭示语言现象背后难以观察的内在语言的加工过程和机制,从而去找到人类语言运作的规律,这也同时暗示了“构式”语言学研究认识论上的改变。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乔姆斯基的心智主义哲学思考的引领下,句法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内部的原则性和外部的界面联结性研究都得到了像其它自然学科一样的成体系的学术推进。这些推进性研究的共同点就在于承认有句法这一“事物”,而并不把它归结为其它已知的概念、符号、联结等。由此而言,对于“修辞构式”的研究似乎应作这样的思考,如果人类的语言现象中存在“修辞构式”,那么“修辞”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研究个体,它应该有自身的本体论研究基础。“修辞构式”所依托的结构应该源自于“修辞”本身,而不能托付于句法再进入研究的中心。因此,“修辞构式”也似乎不需要在“语法构式”里寻找位置。如果我们作进一步思考,那么修辞学的主要工作是否也应该从搜集修辞素材并加以归纳分类转向研究修辞本身,即研究修辞对语言及相关自然、社会、人文现象的创造性上。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思考,人类是否有独立的“修辞能力”,我们是否可以将“修辞能力”这一命题作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并且对于“修辞能力”的研究是从某种假设出发去建立理论模型,从而以有限的理论分析去解释无穷多的修辞现象。或者说,人类的修辞能力是否可以从人类的语言能力中剥离,它的存在是否是对语言(或其他相关物象)的崭新塑造,并且它又是如何塑造包括语言的一系列相关物象的?在这里,什么是“修辞”,借用徐烈炯对于语义学研究的比喻^①,它在本质上不应等同于“法国的首都在哪里”“爱因斯坦哪年退休”之类的问题,有现成的答案,而应属于“什么是物质”“什么是光”之类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

把“修辞”当做独立个体事物并研究其系统的工作目前似乎还少见。从“就学术面貌而言,走出狭义的修辞技巧,走向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中可以反推,当代修辞学的研究还着重于“修辞”之后的技术性技巧的研究;而从“就学术视野而言,走出‘纯语言学’场域,在‘纯语言学’和‘超语言学’之间重建文学修辞研究的支点”中可以反推,当代修辞学的研究仍然拘囿于“纯语言学”场域进行着传统的修辞与语言学互存共生的关系研究中^②。中国近百年的修辞学研究范围涉及了“从辞格到语体及同义结构的各个方面”,但“近百年修辞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对修辞效果的关注,即‘语言的艺术化的技巧及其选择’”^③。可见,修辞学研究至今仍关注修辞形式和现象,而对“修辞这一个体其本身到底是什么”,以及“修辞是如何发生的”这样的问题,似乎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虽即如此,美学、文学的修辞学转向以及“广义修辞”概念同时的提出^④,以及对修辞行为的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进行的初探^⑤等,均暗示了学界对于“修辞”作为独立本体事物的承认和挖掘,这也许是某种“修辞”研究发展的可及方向。

中国的修辞学研究在传统意义上与语法学并无瓜葛。陈望道定义修辞为修饰文辞或调整、适用语

① 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标准理论到最简方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② 谭学纯:《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

③ 胡范铸:《汉语修辞学与语用学整合的需要、困难与途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④ 谭学纯:《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

⑤ 胡范铸:《“修辞”是什么?“修辞学”是什么?》,《修辞学习》2002年第2期。



词,并认为修辞学的最大功用“是在使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①。沈家煊曾言中国古代只有修辞学而无语法学,著名的《文心雕龙》是修辞范本。沈先生认为肇始于一百年多前的《马氏文通》逐渐让语法学成为显学,而将修辞学挤入边缘。但是,“汉语离开了语用或者修辞就很难讲语法,或者没有多少语法可讲”^②。彼时,将汉语的语法和修辞归入同一范畴,或者说将修辞并入语法研究已经萌芽始现。范晓的研究指明语法的句式是修辞的“重要资料和凭借”,因为“任何句子都有一定的语法句式,只有在一定的题旨和情境下充分和有效地运用已知的语法句式来用词造句,才能更好地表达思想并进行交际”^③。范先生举例说明,“反问”和“设问”的句式义是常规义的突破,所以是一种“积极修辞”手法,其术语定性来源于陈望道^④,从中也可窥见修辞与语法融合研究的思想麦芒。可以看出,对于修辞的研究,现代的部分语言学家并不将其剥离于语法,而是希望将它们逐步整合,为修辞学研究探寻一条新的出路。建立在“语法构式”立论基础之上的“修辞构式”在其根本上也是学科联结思想的啼声,而这样的思想在无形中将“修辞”归入了“语法”的研究范畴,让“修辞”脱离了自身本体的“元语言”表达,与“语法”交错而成为“外部语言”的塑造对象。

二、修辞构式研究的主流思想及疑问

近10年中国学界对于“修辞构式”的研究多在“语法构式”框架中展开。一些学者审视了修辞与语法可能的因果联结,寻找了“构式”框架中修辞的表现、修辞与语法的触碰点、修辞在构式框架中的心理认知特点以及构式框架中修辞与语法的错位等。

对于修辞构式的动能性来源问题,康志峰等的《“一W—W”修辞构式探析》作了回答,这也是可查的文献中最早对“修辞构式”概念进行了阐述的文章。虽然未对“修辞构式”作理论定义,但文章提出“修辞构式”是某种“动能要求”,并且是“一定修辞动因对语法构式重加塑造的结果”^⑤。从文章中看,修辞与语法关系的信息可以这样解读:a. 语法构式可以被重新塑造,b. 修辞动因是新语法构式的塑造者,c. 修辞构式存在于修辞动因对于语法构式的推动过程中。论文的思想简洁而明了,修辞与语法紧密联结,修辞推动了新语法构式的形成。

对于修辞构式与语法构式互动性联结并互相推动演化的理论研究来自于刘大为的《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一文。文章针对“修辞构式”进行了明确而深入的探讨,得出的结论是: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可以被描写为一个连续统。这个“连续统”之所以得来的理论逻辑是: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均是“构式”基础上的表现。前者是任何一种可以从构成成分推导其构式义,或者虽有不可推导的构式义但已经完全语法化了的构式;后者是带有不可推导的,或者其不可推导性还没有完全在构式中语法化的构式。语法构式与修辞构式“连续统”的基本表现是“连续统”的一端是可推导的最典型的语法构式,另一端是不可推导的最典型的修辞构式。修辞构式不可推导的意义在构式中凝固而表现出语法性质的过程就是修辞构式转化为语法构式的过程^⑥。对于修辞构式到语法构式这样的推导和转化过程的理论表述,陆俭明的《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再到语法构式》表达了相近的观点^⑦。陆先生从具体的语法学的角度,多层次地引例论证了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两条重要演化条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32年版,2001年重印。

② 沈家煊:《谈谈修辞学的发展取向》,《修辞学习》2008年第2期。

③ 范晓:《语法的句式和修辞的关系》,《当代修辞学》2011年第1期。

④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32年版,2001年重印。

⑤ 康志峰、邱东林:《“一W—W”的修辞构式探析》,《修辞学习》2009年第2期。

⑥ 刘大为:《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3期、第4期。

⑦ 陆俭明:《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再到语法构式》,《当代修辞学》2016年第1期。



件(角色和侧重关系的变化、构式义的引申)的存在,认为构式语法理论为修辞研究提供的是一个新的视角,并有益于修辞学和语言学前沿理论的对话,也能使修辞学更好地融入现代语言学。

在对修辞构式与语法构式如何互相表达的研究中,李宗宏、卢惠惠、赵琪、陈文博、蔡瑱、黄友等的文章表达出较强的关联性。李宗宏认为,在现代汉语中某些表现为致使者和被使者发生了句法位置上“反转”或“倒置”的句子,例如“那个瓶子摸了我一手油”等,是“主观归因”的结果。在理论归结上,作者认为“主观归因构式是汉语中一种特殊的致使表达形式”,并且认为这种主观归因构式有其修辞动因,即“人们对致使场景的认知经验以及特殊的交互意图”。文章认为语法构式是“一种固定了的语言形式”,而修辞构式是“对话语场景的反映”,其表达现象则尚未固化。因此,“主观归因构式”是“修辞构式”的一种^①。卢惠惠等、赵琪、陈文博、蔡瑱、黄友^②等也分别从具体的现代汉语普通话或方言的“构式”句中,探讨“修辞构式”形成的心理认知机制、事件环境因素以及“修辞构式”的表达及表现特点。

对于是否存在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这一“连续统”的问题上,吴春相的研究对此作了例证性探讨并有了肯定的回答^③。研究选择了现代汉语的“数+量+形(形容词)”结构进行构式义上的解析,认为典型的语法构式具有可推导性,其语义重心在前面的“数”,而典型的修辞构式具有不可推导性,其语义重心在后面的“形”。与此形成相对的是,李艳等的研究引入了语用的视角探讨了修辞构式与语法构式的分别。文章认为处于“连续统”的两端的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的分别,是语用表达功能的视角问题,而不是它们的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的问题^④。

对于修辞构式的研究,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修辞构式均依托语法构式而存在。换句话说,有学者认为修辞构式与语法构式有极大的关联性,虽然大部分的修辞构式依托语法构式存在,但仍然有部分修辞构式却是“叛逃者”,脱离了语法构式而以其他的方式存在。施春宏的研究认为有相对于语法构式的修辞构式的存在,但修辞构式如谐音、顶真等却并不依托于语法构式。研究认真探讨了现代汉语中所谓“变零”这一语言使用现象,认为这种修辞方式也是一种没有语法构式依托的“修辞构式”(即“变零构式”)。虽即如此,研究在修辞构式的概念域中仔细探讨了“变零构式”的增殖效应及其他^⑤。施春宏在研究中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连续统”思想,并尝试着拓宽了“修辞构式”的概念内涵,也在客观上发展了“修辞构式”的研究领域。

与目前学界研究的“修辞构式”具有同样命题意义的是王珏的“辞格构式”。王先生认为“辞格构式”是对“零度构式”在句法、情态或语篇上的偏离^⑥。其中的“零度构式”相当于语法构式。而“辞格构式”除了在形式上与“零度构式”相异外,辞格的功能性带来言者主观上对命题意义表达的认知需求。简而言之,“辞格构式”包含“零度构式”的句法、情态和语篇的形式和功能要素,增加了“零度构式”所不具备的修辞形式和功能要素。如果说王先生的“辞格构式”可以被理解为“修辞构式”,那么这个“修辞构式”和与之相对的“零度构式”似乎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从上述对于修辞构式的动能性来源、与语法构式互动性联结、与语法构式如何互相表达以及是否

① 李宗宏:《主观归因构式及其修辞动因》,《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2期。

② 卢惠惠、刘斐:《从语法构式“被”字句到修辞构式“被组合”》,《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赵琪:《从极性程度的表达看修辞构式形成的两条途径》,《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1期;陈文博:《“有一种X叫Y”构式的语义认知考察》,《当代修辞学》2011年第2期;蔡瑱:《舟山话中的修辞构式“X勒口无咒处去”》,《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3期;黄友:《浅析修辞构式“否定”S人VO物,肯定”S物VO人”》,《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5期。

③ 吴春相:《现代汉语“数+量+形”结构的机制和动因——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1期。

④ 李艳、全国斌:《语法构式与修辞构式的衍变关系例说》,《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⑤ 施春宏:《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及相关问题——以变零构式为例》,《当代修辞学》2017年第3期。

⑥ 王珏:《从构式理论、三层语法看辞格构式的生成》,《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1期。





存在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这一“连续统”的问题等的概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近十年修辞构式研究的主流思想是,绝大部分的修辞构式借助语法构式而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语法构式而让新的语法构式“出生”并长大成型。修辞构式较之于语法构式,前者对后者是种依托性的存在。在研究中,修辞构式并不以“修辞”为本体形态来依靠,对修辞构式的研究以语法构式为起点也以之为终点。

但是,对这样的相对于“语法构式”而存在的“修辞构式”其本身的存在与否,学界也有质疑之声。侯国金等认为“修辞构式”只是个“有标记性”的“语法构式”,似乎不应有“修辞构式”概念的出现,因为“没人能说构式语法不应该研究或包括修辞学意义的构式”^①,并且“构式”研究的代表人物 Goldberg 在其书中也举过具有修辞色彩的“构式”例句^②。除此之外,侯国金等还认为,如果存在相对于语法构式的修辞构式,那么学界认为的“不可推导性”能成为“修辞构式”区别“语法构式”的标准应该是有疑问的,因为“是否可推导根本上是个语用问题”^③。

三、修辞构式的再探讨

我们说过,“构式”理论的产生有其本体论的基础,“语法构式”是建立在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语法”基础之上的。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修辞构式”如果要存在,“修辞”就应该成为一个研究的本体而不能托付于句法再进入研究的中心,“修辞构式”也不应该在“语法构式”里寻找位置。

Goldberg 对“构式”的定义是这样的:C 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 (Fi, Si),且 C 的形式 (Fi) 或意义 (Si) 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C 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的预测。^④

如果修辞有构式,那么似乎它的表达式应该视同语法构式,为:M 是一个修辞构式当且仅当 M 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 (Fi, Si),且 M 的形式 (Fi) 或意义 (Si) 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M 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修辞构式中得到完全的预测。

如果这个套用语法构式的定义适用于修辞构式,那么修辞构式应该如何?如果不适用,那么修辞构式又该如何,或者是否有真正的修辞构式?

首先,修辞本身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其独立性应该等同句法,其本身不应该是语法或其副产品。那么修辞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通过对“句法构式”及围绕“句法构式”形成的语句的各因素的再思考,并结合观察学界所认为的成功的语句修辞案例,我们发现了语句修辞产生的可能原因。

(一) 不对称性

不对称性以我们对句法、语义表达的“普遍”(典型)情况为标准,如果语句中的句法、语义表达偏离“普遍”(典型)情况,我们就认为产生了不对称性。而正是因为不对称,修辞才会产生。就狭义的句子修辞来说,不对称包括了动词题元结构或数目的不对称、题元结构和句法结构的不对称、词汇义与世界知识的不对称、词性与句法功能的不对称等等,我们举例说明。

① 侯国金:《评“语法构式、修辞构式”二分法》,《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② Adele E. Goldberg 1995,《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③ 侯国金、邢秋红:《“不可推导性”作为标准的虚妄:兼评“修辞构式观”》,《外语教学》2017年第2期。

④ Adele E. Goldberg 1995,《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 动词题元结构或数目的不对称

动词题元结构的不对称指的是出现在某种语法构式中的动词其题元结构和语法构式所要求的题元结构出现了偏差,其中包括了题元数目的不对称和题元角色的不对称。例如:

实告诉你,我昨夜作了一个梦,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钱,不可叫本房人烧,要一个生人替我烧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请了这白钱,巴巴的和林姑娘烦了他来,替我烧了祝赞。
(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八回)

“烦”可以是一元动词,如“你别烦了”或“叫他别烦了”,其常态下要求的只是施事题元,本身不具有致使义。“烦”也可以是二元动词,如“叫他别烦我了”,具备施事和经验者(experiencer)两个题元,因为“烦”的人不是他而是我。而在“巴巴的和林姑娘烦了他来”中,其句法构式所拥有的应该是像“要求”“使唤”等具有强烈致使义的二元动词,包括了施事题元和受事题元。相对于寻常具有致使义的动词“使唤”等所带的施事与受事题元,“烦”的宾语所具有的经验者题元与通常此位置所应具有的受事题元有角色上的偏差,因此这个句子在整体上有了动词题元结构的不对称,产生了修辞。

周仲伟的感想也是滚得远远的。他那过去生活的全部,一一从他眼前滚了过去,……(矛盾《子夜》)

动词“滚”可以是二元动词,它可以带有施事题元和受事题元。我们通常说的“孩子滚球玩”就是“滚”携带施事题元“孩子”和受事题元“球”的体现。“滚”也可以是一元动词,携带经验者(experiencer)题元,但必须是非抽象名词,如“球滚走了”中“球”就携带了经验者题元。但是,例句中处于主语位置的“感想”显然不是以“施事”或“受事”题元角色出现的,而又因为“感想”是个无生命抽象名词,它也无法扮演经验者题元角色。此例同样由于动词要求的题元角色和宾语实际体现的相应题元出现了不对称,形成了修辞。

韩玄子已经在堂屋里训斥老太婆话太多,又要去喝茶,保温瓶里却没有水了,就又嚷着正在梳头的小女去烧水。(贾平凹《腊月·正月》)

同上文“巴巴的和林姑娘烦了他来”所析,“嚷”是一元动词,其常态下要求的只是施事论元,本身不具有致使义。而此句的语法构式所拥有的也是像“要求”“命令”等具有强烈致使义的二元动词,需要的是施事和受事(本文 patient, themes 同译为受事)两个题元来承接。但“嚷”的一元性无法让其后的“正在梳头的小女”去承受受事题元,这里的语法构式需要的题元数目与实际动词可以携带的题元数目产生了不对称,从而形成了修辞。

2. 题元结构和句法结构的不对称

题元结构是句子中的谓词赋予的,而句法结构中的主谓宾结构有可能不与题元结构很好地配对,由此产生修辞。例如:

怎么办呢?要不我到对街饭馆炒上两个菜,拿饭盒装回来?(黄蓓佳《没有名字的身体》)

“炒”是个二元动词,要求的是施事和受事题元角色。“我到对街饭馆炒上两个菜”中,“炒”的句法主语是“我”,但施事显然不是“我”了,而是“饭馆里的炒菜师傅”。虽然,此例中“炒”的句法宾语还是“菜”,受事也还是“菜”,句法宾语和题元角色都没有变,但是施事角色无形中转移了。这样就造成了例句中句法的主宾语结构和题元的施受结构的不对称,修辞也就随之产生。

3. 词汇义与世界知识的不对称

她们被幽闭在宫闱里,戴了花冠,穿着美丽的服装,课时陪伴着她们的只是七弦琴和寂寞的梧桐树。(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向日葵的花瓣荡漾着金黄的幸福,一阵手风琴声来自围墙院里。(刘白羽《新世界的歌》)





这是撒了一个玻璃质的谎,又脆薄,又明亮。(钱钟书《围城》)

就现实世界的人类经验来看,作为非生命体的“梧桐树”是无法产生人类“寂寞”的感情的,人类感情之一种的“幸福”也无法用肉眼看到其“金黄”之颜色的,更不用说“谎”言居然还有“玻璃”的质地。“寂寞的梧桐树”“金黄的幸福”以及“玻璃质的谎”之所以被认为是修辞,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在于各个短语词汇的结合意义与我们的世界经验知识的不对称,所以产生了修辞。

洋车时行,我们就照样糊洋车,汽车时行,我们就糊汽车,我们知道改良,可是有几家死了人来糊一辆洋车或汽车呢?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对“糊(第二声)”的释义是:用黏性物把纸、布等粘起来或粘在别的器物上,如糊信封、糊墙、糊顶棚。但是例句中“糊洋车”“糊汽车”等指的是“糊”一个纸质的“洋车”或“汽车”,如果没有中国传统的丧葬知识,就无法从字面上理解它们的含义的。为什么认为“糊洋车”“糊汽车”是修辞呢?原因应该就是“糊”的词汇意义与我们的世界文化知识的不对称。

4. 词性与句法功能的不对称

现代汉语研究认为现代汉语的动词、形容词和名词都可以充当谓语,但首先名词极少充当谓语,即使名词充当谓语也不会携带宾语以及有时态的变化。但是,例如:

老栓,就是运气了你!(鲁迅《药》)

在他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以至于对自己的事都一点也不敢豪横……(老舍《离婚》)

“运气”和“科员”都是名词,在两个例子中均充当了谓语成分,并且名词“运气”携带了宾语“你”,名词“科员”后接现代汉语完成态标记“了”有了完成态的句法表达,而这些特点都不是现代汉语名词所“正常”具备的。这两个名词由此表现出了名词词性和名词句法功能(不能充当带宾和有时态变化的谓语)的不对称,产生了修辞。

(二) 修辞义和修辞形式

就“构式”本身来说,构式理论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叫“配对(pair)”。构式理论认为“构式”就是某种“配对”,这种“配对”包括“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

借鉴于“构式”定义形式的“修辞构式”,就其本身来说,也有“配对(pair)”的核心概念,它 also 包括了“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即“修辞形式”和“修辞义”。我们先来说“修辞义”。

1. 修辞义

修辞义不等同于修辞,修辞是在各种不对称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如果可能,这个综合体应该有形、义等多方面内容。那么修辞义是不是同词义、句义一样有着实际的指称,在现实世界里找得到它的存在?我们不认为如此。

比如:“……巴巴的和林姑娘烦了他来,替我烧了祝赞”(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八回)中,“烦”原是让人烦心、不悦的意思。在例中的意思是吩咐(指使)他人去干活,并带有了让人不悦的情绪。如果例句中的意思和“烦”的原义相减,剩下的就是“指使”义了。但按照上文的分析,“指使”的获得有其出处,就是句中的语法构式赋予的,句中的“构式义”就是“致使义”或曰“指使义”。两相加减,指称义所剩为零。所以修辞义不可能是指称义。

既然不是指称义,那么修辞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修辞义有可能是功能义。并且,我们还认为,修辞是个界面。在这个界面上,修辞功能将参与修辞的各个物象(我们称之为未修辞体和修辞体)相互联结,以完成整个的修辞工作。而参与修辞的物象,均至少包含了句法的构式义、语句和词汇的本义。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接下来分析。





凡是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我觉得立在大荒野的边界,到处都是飞沙。(《点滴·沙漠间的三个梦》)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赠韦左丞》)

灌醒了时,披头散发,满地打滚,哭得天昏地暗,连严监生也无可奈何。(《儒林外史》第五回)(以上例句均来自陈望道1932《修辞学发凡》)

以上的例子分属于传统修辞学上的譬喻、借代和夸张,虽然这些例子分属不同的辞格,但是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所有例句中,其修辞前部分(未修辞体)和修辞后部分(修辞体),不论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比如:“《四书》、《五经》”和“敲门砖”的“作用”“文官考试”和“敲门”的“形式”“大荒野、飞沙”和“浊世、恶俗”的“环境”“纨绔、儒冠”和“富贵子弟、文人士者”的“外形”“天昏地暗”和“情绪的失控”的“状态”等等,都有某种视角上的相似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未修辞体(《四书》、《五经》、文官考试、浊世、恶俗等)和修辞体(敲门砖、敲门、大荒野、飞沙等)在一个界面(interface)上进行了联结,并作了个相似性的解读。

再取上文例子的分析:

“老栓,就是运气了你!”(鲁迅《药》),在此句中,“运气”“你”的词汇原义都存在,但是因为句子的语法构式赋予了句子施受构式义,而这个构式义又在句中的谓词“运气”上获得表现。“运气”的名词性和被构式赋予的句法功能在此句中产生了不对称,所以修辞产生。

但是,行文至此,我们仍然认为,此时的“修辞”还不是“有效的修辞”,不对称性形成的是修辞的“雏形”,或是产出了修辞的“可能形式”,因为在以下的例子中,“有效的修辞”不能形成:

实告诉你,我昨夜作了一个梦,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钱,不可叫本房人烧,要一个生人替我烧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请了这白钱,巴巴的和林姑娘开心(烦)了他来,替我烧了祝赞。(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八回)

“开心”是个一元动词,如“别开心得太早”。在上例这个二元致使结构中,它的地位等同于原句中的动词“烦”。但是,我们在“开心”的句子中,感觉到了这是个失败的修辞句,这不是因为不对称性不存在,而是有其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相似性”。“宝玉”那时的心情和“开心”没有任何相似可言,或可以说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修辞的产生要分成三个步骤:a. 不对称性首先形成修辞雏形并产生界面;b. 修辞功能将未修辞体和修辞体在界面上形成联结;c. 进行修辞义层面的相似性解读。

照此,前例“老栓,就是运气了你!”(鲁迅《药》)可以分析如下:a. “运气”的名词性和它在此句中的句法功能的不对称产生修辞雏形和界面;b. 同时产生的修辞功能将未修辞体“(有人有)运气”和修辞体“运气了你”联结在修辞界面上;c. 修辞义对“(有人有)运气”和“运气了你”作相似性解读。因为此句中,未修辞体中“(有人)”的“运气”的获得和修辞体中有了对象的“运气”的赋予,是有着明显的相似性的,所以修辞是成功的。

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修辞梳理为:语句的各种不对称性形成修辞界面,之后产生的修辞功能将未修辞体和修辞体在这个界面上联结,并作修辞义上的相似性解读,如果解读成功,那么有效修辞形成,如果不成功,那么就是无效修辞。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语句的各种不对称性形成一个界面并产生功能,这个界面我们称之为修辞界面,这个功能我们称之为修辞功能;修辞这个联结功能的产生是因为未修辞体和修辞体要做相似性解读。所以,修辞功能我们可以描述为:让修辞体和未修辞体联结到修辞界面,以备作后期的相似性解读。而这种相似性背后的相似义我们称之为修辞义,





所以修辞义是功能义。修辞的形式化表达可以描写为:修辞=(未修辞体+相似性解读+修辞体)/修辞界面,即修辞等于未修辞体和修辞体在修辞界面作相似性解读。在修辞界面上,如果未修辞体和修辞体是可做相似性解读的,那么修辞是成功的,否则就会被淘汰。修辞的这种后期解读功能就是我们认为的修辞义,但它是功能义,而不是指称义。

在这样的立论基础上,我们再做作实例分析:

王一男在思考“这个雨季为什么如此漫长”的问题中懒散地走着,直把暮色走得越来越浓。
(初雪《一切都与你无关》)

例中,“暮色”“走”“越来越浓”在句子中都保留着词汇原义,而句中“把”的语法构式却赋予了句子以“处置”的构式义,从而“走”可以“处置”“暮色”而“使”它“越来越浓”。

其间因为动词要求的题元角色和宾语实际体现的题元角色之间的不对称让这句话首先产生了修辞界面,这个界面让修辞行为“有地可去”。而其后,在修辞功能的促使下,未修辞体“走得很漫长”和修辞体“走得暮色越来越浓”得以在修辞界面上联结。随后又因为“走得很漫长”和“走得暮色越来越浓”在时间延续性上是有相似性可依的,在修辞义的相似性解读下,这句话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修辞工作,从而形成了成功的修辞语句。

由此,我们得出最终的假设:各种不对称形成了修辞(雏形)和界面,修辞界面形成后产生的修辞功能又将不对称双方及其它物像联结在修辞界面上进行相似性检验,如果检验合格,修辞语句成功出现,如果相似性检验不合格,那么就被淘汰。这样的假设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不是所有的被动句都具有修辞色彩,而所有的被动句的题元角色却都会与句法结构的主宾语位置产生不对称。

2. 修辞形式

梳理了修辞界面和修辞义(功能义),那么修辞形式怎么去理解呢?形式应该是排除了成分意义的独立个体。我们来看具体的例子:

我拿了新闻看。长腿装着无聊的脸,坐在安乐椅子上。(鲁迅译《现代日本小说集·沉默之塔》)

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柳宗元《封建论》)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

上文例中,所谓的借代,“长腿”指的是有长腿特征的人,借特征指人,修辞体“长腿”在文中出现,未修辞体“人”不出现;所谓的譬喻,“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修辞体“风、草”和未修辞体“君子之德、小人之德”两两对等出现在文中;而所谓设问,如“天地果无初乎?生人果有初乎?”以及所谓感叹,如:“噫吁戏,危乎高哉!”其未修辞体出现,而语句中所要表达的修辞的“感情”却不出现,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

所以,我们认为,修辞的形式可以有三个大类,包括了:a. 未修辞体和修辞体均显现(overt); b. 未修辞体隐现(covert),修辞体显现; c. 未修辞体显现,修辞体隐现。陈望道(1932)《修辞学发凡》中的辞格,所谓的譬喻、映衬、摹状等,均属第一类形式,未修辞体和修辞体均显现;所谓借代、引用、仿拟等,均属第二类形式,未修辞体隐现(covert),修辞体显现;而所谓设问、反问、感叹等,均属第三种,未修辞体显现,修辞体隐现。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于语句修辞的各方面的探索,其内容包括了修辞的形成、修辞界面、修辞义和修辞形式。

(三) 修辞构式

在我们的研究中,如果修辞有构式,那么它的表达式应该修改为:M是一个修辞构式当且仅当M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Fi, Si),且M的形式(Fi)是在M的意义(Si)对未修辞体和修





辞体作相似性解读后,结合其上的有效的类别形式。

这里的“修辞构式”是一个与“语法构式”完全不同的概念。“语法构式”关注的是其内部各要素对于“构式义”的推导性,以及它与外部因素的“可结合性”。而“修辞构式”则关注其对于有效修辞的“解读”或曰“检测”,是有效修辞形成后的类型表达。“修辞构式”和“语法构式”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介于两个层面之间的是“修辞界面”。其中,属于“修辞界面”下层的是“句法构式”,其结构特征是合法语句的表现,其结构特征内部要素与其它外接要素之间的不对称是形成修辞的基础;而“修辞构式”属于“修辞界面”的上层,如果语句要形成有效修辞,则必须在界面上经过“修辞构式”中“修辞义”的相似性解读。如果合格,则进入“修辞构式”中的形式类别,最终体现为某种形式的有效修辞;如果不合格,那么就被淘汰,不能通过“修辞界面”,形成不了真正的修辞。

由此,我们这样理解“语法构式”与“修辞构式”的关系,“修辞构式”是修辞界面以上层面的有效修辞的表现,“语法构式”作为未修辞体的组成要素在作最终的语义表达的时候必须通过修辞界面,如果“语法构式”其内部因素和内外结合体均无不对称性,那么“修辞构式”不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因为其本身不是修辞;如果有不对称性,“修辞构式”的修辞义将对携带不对称性的“语法构式”及其结合体进行相似性解读,修辞形式将做形式匹配,如果合格,那么有效修辞将形成,如果不合格,那么就被淘汰。简而言之,“修辞构式”是对于语句在“语法构式”的基础上可能形成的有效修辞的合法性解读的最后一道门槛。

四、结语

中国学界近十年对于“修辞构式”的主流研究多在语言学界的“语法构式”框架中展开。研究审视了修辞构式的动能性来源、与语法构式互动性联结、与语法构式如何互相表达以及是否存在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这一“连续统”的问题等等。

我们认为,修辞构式的研究应该依靠对“修辞”的本体讨论而展开。研究也应该从修辞对语言以及其他相关自然、社会、人文现象的创造性考察出发,建立某种假设性理论模型,从而以有限的理论分析去解释无穷多的修辞现象,这也应该是修辞本体研究的一个方向。

我们的研究尝试了问题性的探索,试图从“修辞”本体思考出发再建“修辞构式”这一概念。从狭义的语句修辞观察,不对称性应该是“修辞”产生的基础,它包括了动词题元结构和数目的不对称、题元结构和句法结构的不对称、词汇义与世界知识的不对称、词性与句法功能的不对称等。而“修辞”,它应该是“修辞义”对联结在修辞界面上的各主体(修辞体和未修辞体)所进行的“相似性”解读。其中,“修辞义”并非指称义,它是功能义,充当了相似性解读这一功能。如果,界面上的各主体其相似性解读成功,那么“有效的修辞”现象就产生,否则就被淘汰。而“修辞构式”则是结合了“修辞义”和“修辞形式”的工具性个体,它是对业已产生的“有效修辞”的固化体显,它的总体类型是有限的,分别包括了结合修辞义的各种形式:1. 未修辞体和修辞体均显现的形式;2. 未修辞体显现,修辞体隐显的形式;3. 未修辞体隐显,修辞体显现(显现 = overt, 隐显 = covert)的形式。此“修辞构式”与“句法构式”分属“修辞界面”的上下两个层面,“句法构式”是形成修辞的基础层面上的必要因素,因为它是合格语句的载体,而“修辞构式”则是“修辞界面”上层已经形成的有效修辞的形式体现,它可以被认为是合格修辞的有效载体。

而如果,我们将研究的结果推而广之,从广义的修辞学研究来看,不对称性和相似性之间的张力作用,应该是任何包括语言修辞在内的所有修辞成功与否的根本因素。

(责任编辑:陈芳)

